



忆陈公

□王朝智

2025年冬，大雪节气将至，我因身体微恙，久卧家中，终日与旧书为伴，药盏相陪。一日，我拥衾而坐，正对着一册翻得卷边的《夜航船》出神，手机屏幕骤然亮起，一则消息如寒针刺入眼帘。

这是洛阳一位故交辗转发来的短信，寥寥数语，却似一块巨石投入心潭，激起千层寒浪——“新安陈明生先生，已于今年八月朔日午时，驾鹤西去了”。消息下方，附着一张朴素无华的讣告，落款日期是公历2025年8月1日。

我怔怔地僵在原地，手指凝在冰冷的屏幕上，反复摩挲确认那行日期。彼时已是岁尾，这迟来的噩耗，竟在四个多月后才传到我耳中。一股沉甸甸的钝痛，缓缓从心底漫溢开来，渐渐淹没了周遭的药气与书尘。我望向窗外，铅灰色的天空沉沉压着远山的轮廓，云层低缓，仿佛也在为这位老者默哀。

我与陈先生相识，已是三十年前了。那时，我还是个羞涩怯懦的小年轻，蜗居在一间逼仄狭小的出租屋里，对未来满是茫然与彷徨。因一篇关于地方古迹的短文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得以结识了当时在三门峡市政府工作的陈先生。初见之时，我心中颇有些忐忑，想象中的“干部”，总不免带着几分威严与疏离。然而，陈先生却全然不同。他那时四十出头，身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，面容清癯，眉宇间却无半分官气，眼神温煦得如同春日暖阳。听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，他立刻起身，为我沏了一杯清茶，眉眼含笑地说：“后生可畏，能关心这些‘老古董’，是好事啊。”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敷衍与隔阂，唯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真诚，一种平等相待的暖意。这一面之缘，便是我人生中一段幸事的开端。

陈先生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浪的人。他出身于洛阳市新安县的农家，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从最基层的村支部书记做起，而后辗转至渑池县化肥厂，再到洛阳市政府、三门峡市政府任职，最终于三门峡日报社荣休。他的平易近人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通透与谦和。

陈先生的家庭，亦是其为人处世最生动的注脚。他育有两女，皆被教育得温润贤淑、知书达理，在街坊友朋间颇有口碑。有一次，他的小女儿两口子正为琐事斗嘴，陈先生温和地让女儿去厨房帮母亲准备饭菜。客厅里只剩他与女婿时，他亲手递过一杯热茶，缓缓对女婿道：“这丫头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是男子汉，胸襟不妨开阔些，多让着她几分。”随后，他又单独对女儿说：“成了家，便是大人了。夫妻本是同心同体，当互敬互让、彼此包容，你那急躁脾气，也该收一收了。”

更难得的是，陈先生“待婿如子”的话语，绝非空洞的客套。从女婿工作上的点滴关心，到小家庭初立之时的诸多琐碎，陈先生都默默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，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悄然给予支持。或是几句切中要害的点拨，或是一笔不多却恰逢其时的“赞助”，他总做得自然贴切，从不使受助者感到半分负担与难堪。在他润物无声的调和与滋养下，小两口之间的那点小风小浪，很快便化为和风细雨。眼观着这对年轻人的日子越过越安然，陈先生脸上那舒展而欣慰的笑容，我至今记得分明。这大约便是古人所说的“修身、齐家”的智慧——不尚空谈，不事张扬，只藏在待人接物的分寸里，融在调和家庭的日常中。

谁料想，陈先生竟就这样猝然离去。他这一生，从黄土坡地走出，身份几经转换，而内里那份农家子弟的朴厚、读书人的明理、长者的慈爱与公正，却从未有过丝毫更易。他就像一条沉稳的河流，流过不同的地貌，滋养着两岸的草木，默默付出，不事张扬，最终平静地汇入永恒的沧海。

我摩挲着手中温热的药盏，恍惚间仿佛又看见陈先生清癯的面容，看见他眉眼间那温煦的笑容，听见他温和而有力量的话语。

唤醒

□归田

多少年后，我在我的故乡，被一只公鸡唤醒。严格地说，这里并不算是我的故乡，如果把故乡定义为“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”的话。

这个地方是我父亲母亲出生的地方，我是在我父亲用一根扁担把一个家挑到卢氏后出生的，但这里有我父亲母亲的坟墓，还有他们的父亲母亲，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坟墓，那是我的根，我年年要到那里去上坟。上了坟，脚步便踏实了许多。

我年年回去上坟，并不在那里住，都是当天来回，这一次却意外地在老家住下了。住下的原因是，我约了同家堂弟一块去上老坟。那里不只埋着我的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，还埋着堂弟的爷爷奶奶。今年，我们约定，我提前一天回到栾川。

我住在离老坟不远的村子里，那里有我的大姐，她是我父母逃难到卢氏前留在那个村子里的，一直跟着我小姨生活。

大姐家的生活条件如今不错，大姐夫养了些猪、鸡，外甥和外甥媳妇在村里有了工作，他们在路边盖了两层小楼，每个房间都拾掇得很干净。外甥为我收拾了一套几乎全新的被褥，那晚我睡得极其踏实。也许这踏实还来自乡村的宁静，平时乱七八糟的梦也没有再来打扰。

我睡得正香的时候，突然被一声公鸡的鸣叫唤醒。那声音有些遥远，又有些陌生，我用了好大一会儿才确定我正住在一个村子里，那是村子里的鸡叫。我模糊地判断，时间大约在凌晨四点，看

了看手表，正是四点半。

对于“公鸡叫醒服务”，我还是有一点感受的。小时候，母亲喊我上学，叫不醒我的时候，就会说，鸡叫三遍了，再睡赶不上趟了。那时候我就知道是五点了，还要跑十五里路去学校呢。

“公鸡叫醒服务”一般在三至五点，也就是五更天，对应的时辰是寅时。它大约半小时鸣叫一次，要叫五遍才能把天叫亮，我现在听到的应该是头遍鸡叫。

我最后一次被鸡唤醒是六点，这时我的意识已完全清醒，那也是手机闹钟的时间，鸡叫几乎与手机铃声同时响起，声音在静谧的乡村格外响亮。

我赶紧起床，洗漱完毕，提着从卢氏带来的一应冥物来到老坟，堂弟已在坟上等着。我们共同把一些纸条绑在坟上山茱萸的枝条上，在坟前摆上牲肉、水果、干果、馒头之类的祭品，开始在坟前插香、烧纸，然后三叩九拜。

上坟，在卢氏是没有这么大阵仗的，只要在清明节前一周的某个农历单日子里，到坟上绑了纸条，烧点五色纸和一些冥币就是了。可以不拿供品，也可以不放鞭炮，但在栾川就是另外一番情景。

栾川是有祖坟会的，每一个姓氏都有，清明祭祖统一于农历二月十五，这很像卢氏长江流域的一些做法。二月十五，对于栾川的百姓，是一个大日子。这一天，各乡镇街头的饭店人满为患，县

城至乡下的条条道路车满为患。我和堂弟祭拜完老坟，只见各路李氏后人正纷纷向祖坟集结，大约三四十家的样子。祖坟会每年轮流承办，凡李家后人，人人有贵，连我们已迁往百里开外的也不能免。

祖坟在一片一亩大小的荒地里，地里栽着一些连翘树。我们把各色纸条绑在连翘树的枝条上，把丰盛供品摆在一个小桌上，把成捆的白纸和元宝、纸钱堆成一堆，齐齐跪下磕头，既是对先人的一种告慰，也仿佛告诉世人，这个家族人丁兴旺……

天下着小雨，绵密悠长，恰似我们心底涌动的思念泪花。天边一朵朵低沉的云，慢悠悠地飘着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我望着云影一路追思，它牵引着我的目光，缓缓沉入遥远的时光深处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父亲、祖父、曾祖、高祖……他们的身影在岁月里次第浮现。我把李家的族谱郑重地挂在墙上，指尖轻轻抚过一代又一代祖先的名字，循着墨迹，触摸属于我的根脉。

此刻我突然彻悟，每年一次的清明祭祖，何尝不是一场对自我来路的唤醒？一场对家族血脉的铭记？

踏在这片埋葬着祖先的土地上，我的灵魂无比沉重。我想起了《国家》这首歌：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”。此时，我仿佛看见祖国如天鸡昂首的雄姿，正向着浩瀚宇宙高声啼鸣，呼唤着和平、民主、发展的时代强音。

低沉的春云

□张平乐

又临清明。这个“植根”在春天的时节，祭扫、踏青等活动交织成现代人悲欢离合的时代韵律。然而于我家而言，今年清明的春天格外静谧，天边的春云也显得格外低沉。

三年前的暮春，父母相继离世。那一刻，我们全家仿佛塌了顶梁柱，破了遮雨伞。如今再度缅怀，父母的句句教诲，恰似永不熄灭的灯塔，照亮“家和万事兴”的前行之路，又如股股暖流，滋养着家业行稳致远。

父母一生清贫，未曾给子孙留下金山银山，但他们的智慧与慈爱，却是一笔沉甸甸的精神遗产，稳稳传承至今，激励着我们靠正气立身、靠双手兴家。

父亲是个敢闯敢试、敢于创新、永不服输的能者、智者、强者。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，父亲是村里屈指可数、敢想敢干的“胆大之人”。彼时家大口阔、家底微薄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父亲毅然挣脱农耕传家的传统束缚，放开手脚走出家门、闯荡市场，誓要闯出一条除困兴业的路子。

那时的三门峡市区与三门峡西站，是东西两片最繁华的街市。偌大的市场里摊位林立，烟火气十足。可做什么买卖？需要多少本钱？生意的门道有多深？一连串的难题，紧锁了父亲的眉头。退缩回家吗？家里拮据的光景何时才能到头？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又该如何养老？

迎难而上，绝不回头！那年隆冬，父亲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背着冰凉的馍馍，早出晚归在两个市场里转悠了数日。最终，他把目光锁定在西站，将营生聚焦到餐饮业上。

言出必行，定下就干。父亲很快盖起简易棚屋，购置了制作水煎包的火炉、铁鏊、铲子等家伙。次年开春，父亲和姐姐苦心经营的小本生意——水煎包摊，在西站街头正式开张。

人常说，有利无利常在行。为了把生意做红火，每天清晨6点，街上的广播声就是父亲的起床号。他立刻起身，和姐姐一起整理提前准备好的食材馅料，拉着笨重的架子车赶到二里外的摊位。生起炉火、洗净铁鏊、拌好肉馅……当第一盘热腾腾、香喷喷、黄澄澄的水煎包端到客人面前时，父亲总要谦和地问一句“味道咋样”，认真征求建议，反复改良手艺。

久而久之，回头客络绎不绝，人们口口相传为摊位攒足了人气。每逢集会之日，不少乡邻慕名而来，排起长队就为尝一口“老张包子”。

寒来暑往十余载，父亲和姐姐凭着一个炉子、一口铁鏊、一把铲子，硬生生拔掉了家里的穷根，还攒下了不少积蓄。家里的婚丧嫁娶、人情往来，都操办得风风光光，引得乡邻刮目相看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沧桑。年事渐高的父亲把手艺传给兄长后，便告别了西站的老伙计和老摊位，回到老家安享晚年。可他依旧闲不住、坐不住，又扛起锄头、拿起剪刀，躬身侍弄家里的果园和枣园。直到病魔突袭，父亲才放下那把磨得锃亮的小锄头和那把刀口磨平的老树剪……

母亲则是一位心地善良、勤劳贤惠的女性。父亲在外打拼，伺候两位老人、操持家务、喂养牲畜等重活累活，全压在了母亲肩上。她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，凭着柔弱的肩膀，稳稳撑起了这个家。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记忆里，母亲总在凌晨四五点便起身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纳鞋底、补衣裳；三九寒天里，她那双冻得通红的手，浸在冰水里为老人搓洗衣物的模样，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；炎炎夏日的午后，母亲“捻”在织布机上的身影历历在目，至今我的耳边仿佛还回荡着“唧唧复唧唧”的梭子声；她帮失能邻居一口口喂饭的温情场景，冬日里她亲手熬的玉米面馍醇厚的香气，至今令人记忆犹新……

相濡以沫的父母离开我们，已有百余日。二老一生勤劳淳朴的品性、待人接物的厚道、处事行事的稳健、与邻为善的胸怀，让我们终生难忘，并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。



清明絮语

□王赞峰

清晨的风，吹面不寒。它拂过枝头的嫩绿，嫩芽正攒着劲儿舒展腰肢；它摇曳着垂柳的青丝，万条柔丝轻晃着，撞碎一地晨光；它也抚摸着野花点点的田野，紫的地丁、黄的迎春，星星点点缀在青草丛中。大地如一张悄然铺就的绿毯，草尖顶着露珠，散发着春的清新与生机。风掠过青草与蒲公英，托举着衔泥筑巢的春燕，燕翅剪开薄雾，呢喃声落在谁家的屋檐下。

清明，便在这温润又带几分清芬的气息里，悄然而至。它带着二十四节气独有的韵律，牵起生者对逝者的绵长思念，也藏着万物新生的独属温柔。这是一个一半烟火、一半清寂的日子，既有祭奠先人的肃穆，也有踏青赏景的欣然。

十年清明九年雨。雨丝细细密密，像无数根轻柔的银线，将天地织成一片朦胧。远山隐在烟雨中，近处的草木被洗得发亮，连空气里都裹着湿湿的凉意。它没有惊蛰的沉雷滚滚，也不似谷雨时的淅淅沥沥、纷纷扬扬，而是带着独有的沉静与朴素，淅淅沥沥地落着，与人们心底的淡淡哀思悄然相融。

行人步履轻缓，撑着各色的伞，少了平日的行色匆匆，多了几分沉稳与肃穆。雨丝轻抚脸颊，带来一丝清凉柔和，仿佛故人伸出的手，轻轻安抚人

们的哀思与悲戚。细雨一遍遍擦拭着墓碑上的名字，字迹在雨雾中愈发清晰，似在诉说祭扫者对亲人的无限怀念。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往事，便在这雨丝中慢慢浮现，温柔了时光，也湿润了眼眶。

祭奠的人群络绎不绝。他们手持扫帚，清除墓园的杂草，再小心翼翼地给坟头培上新土；献上一束素雅的菊花，或是几枝带着露珠的松柏。这是不曾褪色的孝心，也是千古流传的敬意。风摇柏枝，簌簌有声，仿佛是故人慈爱的回应。

清明，亦是踏青的好时节。云开雨霁之后，天地一片澄明。朦胧消退，远山如黛，落红满地，却不是凄凉，而是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从容。孩童追着风筝，清脆的笑声惊飞鸟雀；老人漫步田间，静观麦苗青青，享受着这片刻的安宁。

清明并不意味着凄清。逝者已离去，生者当自强。清明的风，清明的雨，伴我们哀伤，也伴我们清醒；伴我们珍惜，也使我们释怀。感念逝者，不忘人生来路，那些走过的路、听过的话，都成了我们前行的力量；更不应辜负当下，知来日方长，带着故人的期盼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年年春草绿，岁岁思念长。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，带着思念勇毅前行，便是对故人最好的告慰，也是对美好时光最真诚的回应。

我的伯伯杨书礼

□杨拴卿

豫西的山，层层叠叠地堆积在大地上。我的伯伯杨书礼就长眠在其中一道山坳里——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底张乡东南村。

伯伯杨书礼从小跟着爷爷在村外五里的西南岭上开荒种地，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。他读书用功，成绩优异，却因家贫无奈放弃上学。后来，他成为洛宁县共产党地下组织创始人之一温旭阳的学生。地下党以办读书会为名，在农村发展组织，宣传革命、宣传抗日。伯伯担任“南村读书会”的负责人，同时也是一名小学教员。

伯伯的抗日决心十分坚定。他到处宣讲抗日道理，讲八路军打日本的故事。他恨透了那些不打日寇、专欺百姓的国民党人。一天上午，伯伯正在讲课，教室忽然闯进一个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官，指着伯伯喝令他立刻去找保长。伯伯说等下课再去，军官不依，两人发生冲突。军官伸手揪他衣领，伯伯一闪身冲出教室，却不是逃跑——他从东厢房拎起一根木棍。军官见状，吓

得钻进课桌底下。伯伯劈头盖脸打下去，直打得那军官鼻青脸肿，帽子也掉了，最后骑马仓皇逃走。

1944年春，日军占领洛宁县城。一天傍晚，全村人逃到20里外的五龙沟避难。天黑了，爷爷奶迟迟等不到伯伯，急得团团转。暮色中，伯伯终于回来，却气呼呼地不肯吃饭。原来，他在回山的路上遇见了日军。他告诉爷爷奶奶，他躲在石堰后的灌木丛中，只见日本兵大摇大摆经过，他恨自己手中没有一挺重机枪。好在腰里藏着一颗手榴弹。他轻轻取下后盖，拉开引线，等待时机。眼看大部队过去了，他正着急，忽然一个日本兵从后面追上来——大约是掉了队。这人戴着钢盔，佩指挥刀，腰插手枪，还是个军官。伯伯瞅准时机，“嗖”地扔出手榴弹。那鬼子吓得趴倒在地，可手榴弹偏偏瞎了火，没炸！鬼子爬起来拼命逃跑，伯伯起身就追，追到山道拐弯处，眼看前面就是日军大部队的鬼子拼命叫喊起来。伯伯孤身一人，没有武器，只得跃下地堰，躲进山沟。

坐在山里的石头上，伯伯恨恨地说：“等着吧，老子不杀几个日本鬼子，不算一条汉子！”

他向往八路军，可八路军太远。于是他说服家人，变卖几棵树木，买了一支旧手枪和子弹，参加了当地游击队。1944年春天，日寇西进，伯伯约了同村青年王青和迎敌。在兴华镇附近的后沟，他们与日军遭遇，立即投入战斗。枪声惊动周围村庄，因寡不敌众，两人被包围。他们以土窑洞为掩护，决死抵抗，坚持了近一个小时。弹尽之后，壮烈牺牲。

那年伯伯只有24岁。乡亲们把他的遗体抬回，埋在东南村西岭的荒山上。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这场惨烈的战斗，称赞他们是真正的好汉。

整理遗物时，叔叔杨书忠发现了伯伯珍藏的一本包着“药方大全”书皮的日记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《毛泽东抗战言论集》。这是伯伯留下的唯一遗物。如今，我们将这本书捐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，愿它与烈士的灵魂融为一体。若伯伯在天有知，他一定会感到欣慰。

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